



2022年8月28日

星期日
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管
中共衡阳市委员会主办

文化周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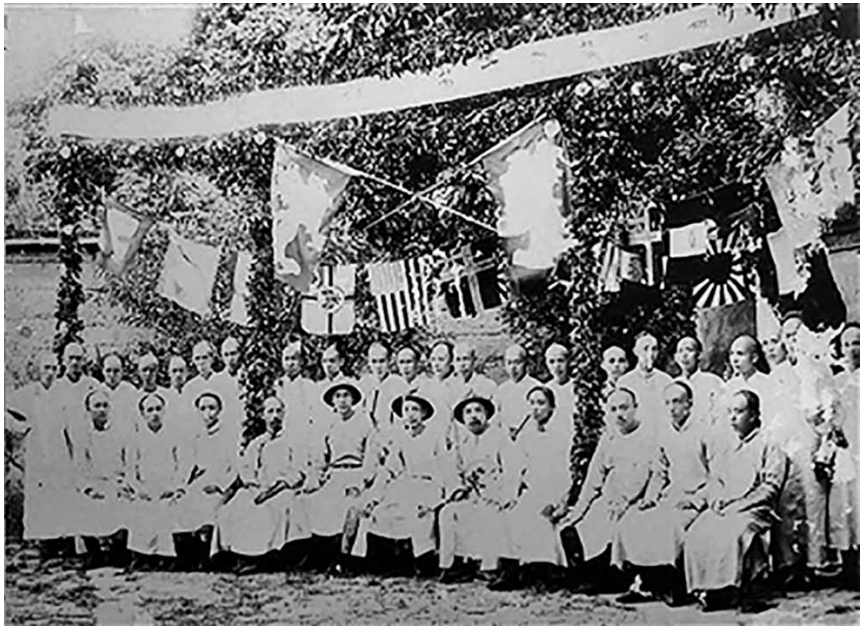
CULTURE WEEKLY

衡阳日报
HENGYANG DAILY

今日四版 农历壬寅年八月初二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-0004 第18275号
衡阳日报社出版

50张
衡阳面孔
廉洁时空

陈嘉言(1851—1935年),字梅生,衡山平田(今衡东县霞流镇平田村)人。光绪十五年(1889年)科举中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,江南道、京畿道监察御史,工科掌印给事中,福建漳州知府。民国后期受聘国史馆编纂,被推举为国会议员。



漳州未任知府陈嘉言(前排右五)参加漳郡教育讲习所第一班的毕业典礼并合影留念,可见他对新式教育的重视程度。

耕读世家 五凤齐飞

陈嘉言出身于耕读世家。祖父曾在江西多地任知县,“所至有声,勤于政事,民称廉能。”父亲在他不满两岁时就病逝了,仅遗薄田数十亩。他的母亲是福建台湾府同知张学尹之女,幼承庭训,博通经史,工诗能文。母亲在父亲病逝后竭蹶支撑,含辛茹苦,承担了教授子女学业的重任。

小时候的陈嘉言悟性极高。“读书过目不忘,初学为文,出语辄惊其长老。”他15岁入县学,得到湖南督学器重,调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创办的湘水校经堂,作为通经史、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人才培养。

陈嘉言三兄弟从母授学,并师从舅父、湘阴名儒张自牧。光绪壬午年(1882年)中解元,与胞兄陈毓光同榜,一时轰动乡里。其后,陈嘉言与胞兄陈毓光、堂弟陈鼎3人先后中进士,堂弟陈范、陈韬两人中举人,被誉为“五凤齐飞”,在朝野传为佳话。

陈嘉言家教甚严,其后代人才辈出。五子陈少梅为民国四大画家之一,是我国近代画坛的领军人物。女儿陈云凤是革命烈士夏明翰之母。陈云凤从小受益于父亲开明思想的教育,一脉相承,着力培养儿女们的爱国思想,自始至终积极支持子女革命。

至终积极支持子女革命。

1928年,陈云凤的三子一女,明翰、明衡、明震、明霁,相继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夏明翰就义前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:“砍头不要紧,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翰,还有后来人。”一门四英烈,举世仰怀。

据说,当时陈云凤的公公夏时济严厉反对儿媳支持儿女革命,斥责为“激进造反,不安分守己”。陈嘉言得知这一情况,气得摔了茶杯,指责亲家公“老年糊涂,不明事理”,从此与亲家断了来往。

松柏本孤直 难为桃李颜

陈嘉言一生为官清正,淡泊名利。任江南道、京畿道监察御史时,他以李白《古风十三首》中的诗句“松柏本孤直,难为桃李颜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他对违法者绝不留情,屡次上书弹劾,使很多贪官污吏一提起他,就谈虎色变,被人称为“铁面御史”。

“奸臣取国不失国,失国之朝无一策。赵家传位四百年,丧自庸奴真可惜。”甲午战败后,清廷割地赔款,陈嘉言痛心疾首,在长诗《木棉庵行》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慨,矛头直指腐朽清王朝的官吏和政策。

对于民主革命,陈嘉言持开明态

度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底,同盟会首义烈士刘道一遇害后,其妻曹氏不久也因过度悲感而去世,陈嘉言含泪写下《刘烈妇传》,讴歌刘道一夫妇的革命事迹。

在《衡山正气集》中,他与孙中山、黄兴等一起热情讴歌民主革命先驱刘道一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。后来,他还将孙女陈佩珩许配给了刘道一的继子刘孝光。

1911年7月8日,同盟会会员、广州黄花岗起义策划者之一的杨毓霖(长沙籍)在英国听闻广州起义失败,愤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,痛心疾首,投海以身殉国,时年40岁。陈嘉言赞其“笃生年少美才,三湘杰出也。”

1920年,毛泽东发动著名的“驱张运动”,陈嘉言凭借其崇高声望,领衔数十名社会名流,在北京向全国发出声援驱张通电,为运动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清风两袖常随我 不负阊阖不负天

1903年,陈嘉言出任福建漳州知府。他在主政期间宽大为怀,爱民如子,廉洁奉公,政声斐然。《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》和陈嘉言的墓志铭对此高度评价:“其科士兴学督理警政,尤无不精当,条理灿然,为全省郡县取则焉。”“凡郡中利弊,力能兴者必兴之,力能去者必去之。”

当时,漳州一带民风彪悍,械斗寻仇的事件时有发生。他以诚感人、以理化人,使私斗的社会风气大为扭转。

漳州城南九龙江北溪经常洪水泛滥,百姓苦不堪言。陈嘉言多次组织乡绅筹集资金,还卖掉衡山老家的祖遗田租40石(约合24亩),购买机器,聘请英、日等国的工程技术人员,深挖淤泥、疏通河道,彻底治理了水患,现在漳州城南的防洪土堤仍造福于当地民众。

陈嘉言还殚精竭虑发展教育。广设新式学堂,创办漳郡教育讲习所,重用著名学者黄仲琴,大力实施兴学育才之举,推动当地教育由旧式私塾向新式教育转变,为漳州培养了大批现代人才。

陈嘉言任职的第二年,晚清最后一次科举乡试。漳州府下属7县,按惯例府试名单都是要出钱买的,这样主事者和有关官员可以得到1.4万两白银,是一大笔收入。陈嘉言义正词严地说,“考试大典怎么能像商品一样用钱来买卖呢?国家法律对此是要严惩的。”“况吾出身科第而徇利忘义耶?”他坚持不受钱财,严格考试,公平取士,选拔了一批真才实学者,

得到了闽漳一带读书人的拥护和爱戴。

1911年,辛亥革命爆发。武昌首义成功后,全国各地纷纷响应,福建宣布独立。漳州官吏潜逃,人心动荡。关键时刻,陈嘉言顺应时代潮流,为推动民主革命,不顾个人安危,召集漳州士绅协商安抚事宜,听其自治,出安民告示称“予愧无泽以加吾民,幸全城生命财产均无恙,今挂冠而去矣,愿公等好为之,以俟新命。”

陈嘉言从漳州挂印回乡时,囊中羞涩,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,不得不将两个幼女托付给漳郡士绅孙宗蔡、蔡同昌,各得资助400银元,作为路费。漳州百姓闻之,无不唏嘘涕泣。

返程途中,陈嘉言深夜独立船头,看到一轮明月,顿时感慨万千,坦然赋《离任福建漳州知府》诗:“莅任九州越十年,愧无德政慰先贤。清风两袖常随我,不负阊阖不负天。”

甘为拙吏安贫贱 不做贪官害子孙

在腐败的晚清官场,盛传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。陈嘉言当官不仅不捞钱,反而倒赔家产,这令亲友们大为不解。为此,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:“宁可吃吊钱(1000文)一斤的肉,不可受八吊钱(800文)一石的租。儿孙强过我,买田置地做什么?儿孙不如我,留给田租有何用?”他的这段话,与林则徐的名言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……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?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还在书房撰写了一副对联自勉:“甘为拙吏安贫贱,不做贪官害子孙。”

传说陈嘉言返程时,船家担心陈嘉言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压舱,怕太轻影响行船安全,但他随身携带的10多个沉甸甸的箱子,把船压得稳稳的。船到家乡码头,乡亲们争相上船帮忙抬箱,以为大有钱财宝物,孰料打开一看,全是满满的书籍。自此,“廉书压舟”被传为佳话。

返乡后,陈嘉言家无积蓄,田产早已变卖,只有“赁宅而居,卖文鬻书以易薪米”,依靠朋友资助和陈氏家族祠接济日子。但他沉浸诗书,怡然自得,别号“锄茶老圃”。

袁世凯阴谋称帝时,鉴于陈嘉言的才气和名声,派人以2万块大洋为诱惑,请他写表“劝进”,他嗤之以鼻,断然拒绝。

1935年4月20日,陈嘉言逝世,享年84岁。他去世后的丧葬费,也是靠亲戚朋友接济才得以凑齐。他能文善诗,所著诗文由其后人编为《锄茶老圃诗文》《九老诗文集》传世。

(本稿由市纪委监委、市地方志编纂室提供)

风雅石鼓

朱熹与《石鼓书院记》

■刘 洁

石鼓山三面临江,1200多年来,石鼓书院受自然损坏在所难免。同时,书院建筑或毁于天灾兵祸,或年久失修,或不能适应书院发展需要,经历了不断修重和扩建的岁月沧桑。有史料记载的重建及大规模修重和重建就达十几次之多,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淳熙年间的修重。

1185年,部使者潘时在石鼓书院旧址上进行修复重建,但工程尚未完成就调离了衡阳。1187年,提刑宋若水继续重修工程,竣工后请朱熹作《石鼓书院记》。朱子《记》中记载了这次重修工程:“淳熙十二年,部使者潘侯始因旧址列屋数间,榜以故额……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益广之,别建重屋,以奉先圣先师之像。”

请朱子为石鼓书院作《记》是石鼓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,而朱熹本人的一生也都与书院结下了难解之缘。朱熹出身儒学世家,父亲朱松是北宋二程的后学。然而,朱熹出生的1130年却是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南逃至杭州临安的那年。幼年的朱熹生活颠沛流离,家庭困顿,两个哥哥都不幸早夭。父亲朱松将振作家族的希望寄托在朱熹一人身上,亲自教导朱熹,传授《孝经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等四书之学。

朱熹13岁时父亲病逝,临终前朱松将朱熹托付给好友刘子羽,又写信请五夫三子的刘子翊、刘勉之、胡宪等三位儒学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。朱熹果然不负厚望,19岁考中进士。朱熹学习期间曾就读于南溪书院、星溪书院、屏山书院等;成年后的朱熹创建了寒泉精舍、云谷晦庵草堂、武夷精舍、考亭书院;又重修了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、湘西精舍(长沙岳麓山下)。

朱熹一生入仕不过8年,其理学思想并不受当朝统治者重视,甚至在晚年备受排挤打压并累及门生学徒,去世后6年才得以平反。然其

编著的《四书集注》从元朝开始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,成为后世读书人必读之书,这大概也是朱熹生前没有料到的。

朱熹一生致力于书院教育,南宋书院的发达与朱熹一生的努力奉献密不可分。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教育家、儒学集大成者,朱熹为书院文化的复兴鞠躬尽瘁,在书院文化的历史长河里可谓功不可没。

朱熹为石鼓书院作《记》时宋朝建立已有200多年,原本生机勃勃的科举制度也开始走向僵化。当时的官学只重科举,不考德行,而士子们也只是只求功名,见利忘义。对此,朱熹在《石鼓书院记》中说:“抑今郡县之学官,置博士弟子员,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。其所受授,又皆世俗之书,进取之业,使人见利而不见义。”“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。”

在对官学严厉批评的同时,朱熹对重修石鼓书院之事大加赞赏:“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”。并教导士子们,治学要做到下学上达,须“养其全于未发之前,察其几于将发之际,善则扩而充之,恶则克而去之”;“讲其言言”还要知晓“从事之方”方能“蹈其实”。朱熹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,倡导以义理之学教育学生,强调书院教育要注重实践。

朱熹在《石鼓书院记》曰:“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,士病无学,往往择胜地,立精舍,以为群居读书之所。而为政者,乃成就而褒表之;若此山、若岳麓、若白鹿洞之类是也。”这里就把石鼓与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并列,由此有了“天下三书院”之说。

由于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,“三书院说”一经提出,从之者众。南宋周必大以宰相之尊主盟文坛,其在公元1202年所作的《太和县龙洲书院记》中曰:“阅两月工已讫告,遂仿潭之岳麓、衡之石鼓、南康之白鹿,榜曰龙洲书

院……”公元1246年,南昌郡守吴泳在其《御书宗廉书舍跋记》中明确提出:“臣尝考国朝建立书院隶于今职方者三,潭曰岳麓,衡曰石鼓,南康曰白鹿洞,皆繇上方表赐敕额,盖所以揭圣范崇道规也。”石鼓书院作为“天下三书院”也好,“天下四书院”也罢,应与朱子为石鼓作《记》不无关联。

朱熹有没有来过石鼓书院讲学呢?查阅相关资料,也请教了相关专家,无法确定。1158年12月与1165年5月,朱熹曾两度差监南岳庙。1167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两个月之久,会讲后来南岳一游七日,一行人和唱诗词一百多篇。作《石鼓书院记》后的1194年朱熹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,又在长沙重修了岳麓书院。朱熹在湖南是有些时日的,再者衡阳城内曾留下了其祖师爷周敦颐少年时的足迹,我们很有期望地推测,朱熹大概是来过石鼓书院的。尤其是其《记》开头一句:“石鼓据蒸湘之会,江流环带,最为一郡佳处。”如无到此,怎会有如此亲临其境之感。

无论朱熹来没来过衡阳,有没有在石鼓讲学,其在《石鼓书院记》中阐述的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,都为石鼓书院后来几百年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原则,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效法,而且影响到元、明、清之后的书院。对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和发展,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在此有必要将《石鼓书院记》全文刊出,以示对朱子的崇敬和怀念。

《石鼓书院记》

朱 熹

石鼓据蒸湘之会,江流环带,最为一郡佳处。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,州人李宽之所为。至国初时,尝赐敕额。其后,乃复稍徙而东,以为州



朱熹作的《石鼓书院记》。

■通讯员 彭琬淇 摄

学。则书院之踪於此,遂废而不复修矣。淳熙十二年,部使者潘侯始因旧址列屋数间,榜以故额,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。未竟而去。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益广之,别建重屋,以奉先圣先师之像,且募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卷,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。盖连帅林侯象诸使者苏侯翊、管侯葵、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费资割田,以佐其役,逾年而后落其成焉。于是宋侯以书来曰:“愿记其实,以诏后人。且有以幸教其学者,则所望也。”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,士病无学,往往择胜地,立精舍,以为群居读书之所。而为政者,乃成就而褒表之;若此山、若岳麓、若白鹿洞之类是也。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,学校之官遂遍天下,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,则其旧迹之芜废,亦其势然也。不有好古图旧之贤,孰

能谨而存之哉?抑今郡县之学官,置博士弟子员,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。其所受授,又皆世俗之书,进取之业,使人见利而不见义,士之有志为己者,盖羞言之。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,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。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,而不敢惮其烦,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。故特为之记其本末,以告来者。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,而无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。又以风晓在位,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害,将有不胜言者。不可以是为遽然而莫之教也。若诸生之所以学,而非若今人之所谓,则昔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,语之详矣。顾于下学之功有所未究,是以讲其言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,而无以蹈其实,然今亦何以他求为哉!亦曰:养其全于未发之前,察其几于将发之际,善则扩而充之,恶则克而去之,其亦如此而已,又何俟于予言哉!